



历史知识丛书

禍国殃民的西太后

北京人民出版社

K828/
2

祸国殃民的西太后

史泽生 编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78726



北京人民出版社

678726

祸国殃民的西太后

史泽生 编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70,000字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071·107 定价: 0.22元

目 录

一、篡政夺权的阴谋家·····	(2)
(一) 辛酉政变, 垂帘听政·····	(2)
(二) 再立幼帝, 二次垂帘·····	(17)
(三) 扼杀新政, 三次临朝·····	(24)
二、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37)
(一)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37)
(二) 屠杀义和团·····	(48)
(三) 反对资产阶级革命·····	(56)
三、崇洋媚外的卖国贼·····	(65)
(一) 屈膝沙俄, 丧权失地·····	(66)
(二) 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不胜而胜”·····	(69)
(三) “万寿无疆”, 三军败绩·····	(75)
(四)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81)
(五) 日俄战争, 可耻“中立”·····	(88)
四、穷奢极欲的吸血鬼·····	(93)
(一) 横征暴敛, 残酷剥削·····	(93)
(二) 淫奢无度, 生活腐朽·····	(97)
五、西太后的幽灵与江青的女皇梦·····	(104)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拉氏（俗称“西太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物。她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可是，在她死后六十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竟又把这具历史僵尸抬了出来，对之顶礼膜拜，表现出不胜仰慕的心情。一九七一年以来，江青先后多次窜到颐和园，学着当年那拉氏的样子，寻欢取乐，作威作福，大做其现代中国女皇帝的黄粱美梦。一九七六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在这时，江青又一次乞灵于那拉氏，毫不掩饰地叫嚣：“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完全暴露了她妄想即位登基、君临中国的狼子野心。

江青无耻吹捧、醉心仿效的那拉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江青为什么对她崇拜得如此五体投地？这就是我们这本小册子所要揭露和说明的问题。

一、篡政夺权的阴谋家

（一）辛酉政变，垂帘听政

一八三五年十一月（道光十五年十月），那拉氏出生在一个满洲官员的家庭里，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名叫惠征，当过安徽宁池广太道道台。那拉氏从小受封建教育，满脑子装着攀龙附凤、富贵荣华的思想。但她早年丧父，家业中落，一时找不到缔姻显贵、出人头的机会。

可是，事有凑巧。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那拉氏在她十六岁的时候，作为秀女被选入宫中。^①她入宫后，被清帝奕訢（咸丰）看中，很快就被封为贵人。那拉氏善于“先意承旨”，很得奕訢的宠幸，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进封为懿嫔。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她生了一个儿子，“母以子贵”，再进位为懿妃。次年（咸丰七年），更进位为懿贵妃，不几年就爬到了仅次于皇后和皇贵妃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和反抗。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形成

^① 清朝制度，凡旗员的女儿适合年龄者每三年一选，由八旗都统造册咨送户部奏请引阅，以备妃嫔之选或指配宗室近支，叫做秀女。

了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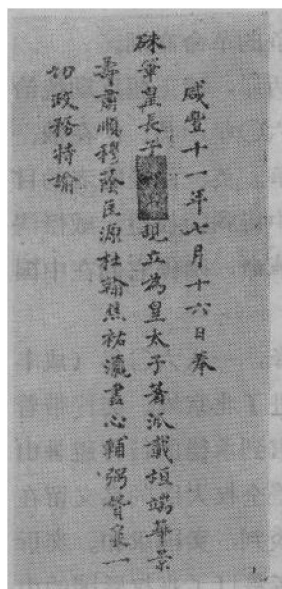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狂飙席卷长江两岸，清王朝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者的目的是企图扩大它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权益，威慑清政府，进而勾结它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确保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妥协投降，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英、法侵略联军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北京城。奕訢带着后妃、皇子和一些贵族官僚，仓惶逃窜到承德的行宫避暑山庄；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则奉命以钦差全权大臣的名义留在北京，与英、法、俄、美四国侵略者谈判，卖国求和。奕訢秉承奕訢的旨意在北京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又在沙俄侵略者的胁迫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奕訢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即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十六日），奕訢遗诏立年方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①。

八大臣根据遗诏拥立载淳嗣位，以明年为“祺祥”元年。二十六岁的那拉氏以皇帝生母的身分与奕訢的皇后钮祜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

^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2册，第57页（遗诏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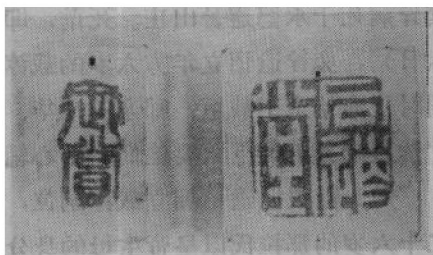


图一 奕訢任命载垣等赞襄政务的遗诏

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接着又为两宫皇太后上徽号，^①钮祜禄氏称“慈安”，那拉氏称“慈禧”。这是她们最初加上的徽号（后来还曾上徽号多次），以后便分别称作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这时朝廷上，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按照奕訢的遗诏，开始主持政务。为了保持清代从无母后临朝听政的祖宗家法、防止皇太后干预朝政，他们最初规定皇帝谕旨由赞襄王大臣拟定后，送呈两宫皇太后钤用“御赏”和“同道堂”印玺，不得更易；臣工的奏折，不送呈皇太后阅看。他们还规定内外臣工呈递的

折报，只写“皇上”字样，不准书写“皇太后”字样。^②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范那拉氏干预政务而设的。

可是，那拉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权欲狂。她对奕訢的遗诏和八大臣的限制极端



图二 “御赏”、“同道堂”印

① 徽号是封建时代专给帝后的美称。

② 《赞襄王大臣在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信》（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不满。她为了自己掌权，根本不顾什么“祖制”、“家法”，决心抓住奕訢刚死、载淳年幼这个有利时机，推翻奕訢的遗命，公开出面从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权。于是在那拉氏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之间，不断发生剧烈的冲突。殿堂之上时常出现“晓晓置辩”^①的场面。那拉氏无法折服载垣等人，便施展阴谋诡计，策划宫廷政变，夺取清王朝最高统治权。

首先，那拉氏设法拉拢奕訢的皇后钮祜禄氏。钮祜禄氏以前与那拉氏后妃之间原不和睦，奕訢死后，在奠祭礼节上也发生过争执。^②这时，那拉氏为了取得钮祜禄氏的助力并利用她顶头出面，便一反常态，对她竭力奉承、拉拢。她危言耸听地劝诱钮祜禄氏出来垂帘听政，说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跋扈狂悖，很象康熙初年鳌拜的行径，只有两宫垂帘听政才能免除这伙人的篡权。经过那拉氏的挑拨和鼓动，钮祜禄氏终于同意了垂帘听政，并同那拉氏一起密订了政变计划。

接着，那拉氏又去勾结恭亲王奕訢。奕訢是旻宁（道光）第六子、奕訢的异母弟，属于近支亲王。他在留守北京期间，与英、法、俄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地出卖了祖国利益，于是便以“通晓洋务”而担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此后，奕訢经常和外国侵略者厮混在一

① 《清穆宗实录》，第5卷，第28页。

②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载有：“夙闻两宫不甚偕洽，所争在礼节细故。”（《热河密札疏证》，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光明日报》）那拉氏所争的是在向奕訢灵前奠酒的顺序问题。她原排在琳妃之后，但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已立为皇帝，这样的奠酒顺序是对她的贬低。争执以后的第二天，她即获得圣母皇太后的尊称。

起，深受洋人的赏识。那拉氏这时之所以要与奕訢勾结，一方面是想利用他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间的矛盾，更主要的则是打算通过他以获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奕訢也是一个野心家。他在清皇室中宗支最近，地位较高，在“抑民奉外”的活动中显示出来的反动“才能”也颇得朝廷上下的赞许。奕訢死后，他未尝不想仿效清朝初年多尔衮的故事，以叔王身分出掌中枢权力。但是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单中却没有他，实权落入了宗支较远的载垣、端华、肃顺手中。这使他很不甘心。加之载垣等人出于猜忌，又对他极力排挤，就使得他更加仇恨。

奕訢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国内农民革命运动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上却不无分歧。例如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奕訢召集的御前会议上，“訢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①特别是在同沙俄关于我国东北领土的交涉中，肃顺在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曾愤怒地驳斥过俄使伊格纳切夫的侵略要求，把沙俄强迫签订的《璦琿条约》抛在桌上，严正宣布它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奕訢在第二年留守北京期间，则同英、法、俄侵略者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大量地出卖了领土和主权。两人态度迥然不同，因之外国侵略者对他们的看法也不一样。英国侵略军头目、全权大臣额尔金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就曾考虑到咸丰帝同“他身边那些歹毒的谋臣”（指载垣、肃顺等）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而恭亲王奕

^①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第2页。

许很可能在这次反复中为肃顺等所压倒。因此他力主英、法联军应对奕訢加以支持。他在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恭亲王将会由于能够劝使我军从北京移驻天津而获得声望。同时，我军继续留驻近在咫尺的天津这一事实，在支持恭亲王的妥协政策方面也将成为一个具有警告意义的论据。”^①这种支持奕訢的主张，在许多外国人的公私函件中都有所流露。外国侵略者“为了可以通过满清朝廷而指挥那种适合他们的利益的政府”，^②自然希望更换这批不友好的实际掌权者，而代之以驯顺的走狗。那拉氏、奕訢之流便都成为他们中意的人选。

那拉氏想凭借奕訢的实力，奕訢想依靠那拉氏当后台，两个野心家在篡夺清王朝统治大权的问题上，相互利用，一拍即合。奕訢在与英国侵略者进行密谋策划之后，便于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八月一日）借口去哭祭奕訢，奔赴承德。

八大臣对奕訢此行，事先虽有所防范，发出诏谕要他“无庸前赴热河”，但奕訢以“叩谒梓宫”为借口，无法阻止。奕訢到承德后，立即受到那拉氏的召见，“奏对良久”。^③就是在这次召见中，他们秘密商订了政变计划，准备搞掉八大臣，夺取统治权。奕訢还向那拉氏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④密谋已定，奕訢匆匆赶回北京，两下

① 转引自坂野正高：《中国与西方（1856—1861）》，1964年哈佛大学版，第218页。

② 拉铁摩尔：《现代中国之创造》，1945年伦敦版，第119页。

③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2册，第65页。另外《热河密札》第七札记载有：“太后召见，恭邸……独对，约一时许方出。”

④ 王闿运：《祺祥故事》，见邓之诚辑《旧闻零拾》。

里分头下手。

这时，八大臣在朝廷上据有重要职位，他们或是亲王，或是御前大臣，或是军机大臣，另外兼管许多差使，掌握军政大权。京城警备和皇帝禁军的指挥权，都操在他们手中。当时的热河行宫^①也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那拉氏处于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对八大臣暂时采取了“外示优礼”的手法，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奕訢返回北京后，立即积极行动，在满汉官僚中间吹风点火，勾结串连，煽起了一片要求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喧嚣，作为他们篡权擅政的舆论。

带头的是兵部侍郎胜保，这是一个掌握近畿兵权的实力人物，也是一个镇压北方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他在奕訢死后八大臣开始掌权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清君侧”的叫嚣。这时他与山东巡抚谭廷襄联衔，故意违反清代祖制，在九月十一日（八月七日）用黄折向皇太后请安，作为效忠的表示。

大学士周祖培、贾桢等人也不甘落后，他们为了替皇太后垂帘听政寻找根据，就在奕訢离京赴热河与那拉氏进行密谋的时候，找到帮闲文人李慈铭，“属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②编成材料备用。李慈铭举出汉、晋、辽、宋四朝八个太后的事迹，并附带辑录了一些“无贤称者”，汇成《临朝备考录》一书，交给周祖培。但是，这些老官僚们一时还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先让御史董元醇出马。

董元醇是周祖培的门生。他按照老师的授意，于九月十

① 即避暑山庄。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第11册，第104页。

四日（八月十日），直截了当地上了一个奏折，以皇帝年幼为理由，请求“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并请“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奏折中还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①

“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这是董元醇奏折要求那拉氏打破祖制、垂帘听政的理论根据。当时热河行宫的一个官员在寄给北京的同僚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②他们所讲的“时势”，主要指的就是当时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燎原烈火，使得整个地主阶级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他们需要更加凶狠残暴并能依靠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刺刀来镇压农民起义的统治工具，以苟延自己的残喘，而那拉氏则成为他们属意的人物。这样，那拉氏的篡政阴谋就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对那拉氏所发动的舆论攻势，进行了抵制和反击。他们以载淳名义发出上谕，指责胜保、谭廷襄具折请皇太后安是“有乖体制”，在穿孝期间呈递黄折“亦属不合”，将两人交部议处，并通令各级官员，今后不准向两宫皇太后请安。董元醇奏折上后，那拉氏召见八大臣，要他们照董折所奏实行。载垣、端华、肃顺等“勃然抗论，以为不可”。^③双方激烈争论，“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④载垣等退朝以后，又拟了一道

① 董元醇：《敬陈从权守经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40卷，第2页。

② 《热河密札》，第四札。

③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1卷，“咸丰季年三奸伏诛”条。

④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第12册，第13页。

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董元醇所奏，“甚属非是”，另行简派亲王辅政，“尤不可行”。当这道上谕送交那拉氏盖印时，由于“西边（那拉氏）执不肯下，定要临朝”，^①争执又起。载垣三人“决意搁车”，^②撂挑子不干，以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那拉氏看到三人还控制着热河行宫的大权，而自己的政变阴谋尚未布置就绪，不敢公然闹翻，只好暂作妥协，“卒如所拟”。^③

下一步，那拉氏便施展阴谋去夺取兵权。胜保提出叩谒奕訢梓宫的请求，得到那拉氏许可，借机把所部军队布署在密云一带。另一个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僧格林沁也已受到奕訢的拉拢。僧格林沁这时正统带蒙古骑兵在山东一带镇压捻军，也致书八大臣，指责他们“拘泥旧制”，“不能取信于天下”。^④

那拉氏所深感不安的是载垣等人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兵权。十月七日（九月四日），她抓住“载垣、端华、肃顺面奏因差务较烦，请将管理处所恩恩酌量改派”^⑤的时机，解除了三人的许多兼差，其中包括步军统领、管理火器、健锐营等皇帝禁军以及扈从护卫等差事。八大臣军权的解除，使那拉氏可以放心大胆地返回北京，逐步实现其篡权阴谋了。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三日），奕訢的灵柩起运回京。从热河到北京只有三百多里的路程，在当时条件下，普

①② 《热河密札》，第四札。

③ 《清史稿·宗室肃顺传》。

④ 《僧格林沁的信》（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⑤ 《清穆宗实录》，第4卷，第5页。

通行旅只需五、六天即可到达。但是,奕訢的灵柩既大且重,要用一百二十人肩抬,沿途山路崎岖,沟梁纵横,行进十分迟缓。按照嘉庆帝死时的礼制(他也是死在热河,归葬北京的),大行皇帝灵柩启行之前,新帝及后妃在灵前祭奠已毕,即可先行,以快班轿夫兼程前往,先期返京,以便当灵柩到达时,在城门口恭迎。那拉氏袭用旧制,在其亲信荣禄率兵保护下,偕同钮祜禄氏和小皇帝载淳匆匆上路。她故意把护送灵柩的重任交给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核心人物肃顺,把他拖在后面而让其他王大臣扈从帝后先行,这样,就把八人拆散开来。先行的七人离开肃顺,变得群龙无首;肃顺一人在后,也落得孤掌难鸣。在那拉氏精心设置的圈套面前,他们陷入了只能束手就擒的不利局面。

那拉氏在路上行了六天,于十一月一日(九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比奕訢的灵柩早到四天,这就为她发动政变赢得了时间。回到北京的当天,她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召集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第二天黎明,在那拉氏和奕訢的主持下,发动突然袭击,在宫廷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这时肃顺护送奕訢灵柩,还在密云途中,也被那拉氏派去的醇亲王奕譞逮捕,押解来京,一起交宗人府治罪。

十一月八日(十月六日),那拉氏以幼帝载淳名义发出上谕,宣布八大臣被罗织的罪名和应受的处分。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决,其余五大臣革职。按照清制,宗室有罪至死者,只在宗人府^①赐自尽。由于那拉氏对于肃顺最为嫉

^① 掌管皇族的谱牒、爵禄、支派、教诫、赏罚、祭祀等的机构,长官为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

恨，特地将他斩首示众。肃顺在菜市口刑场临刑之前，面对围观群众，愤怒斥责那拉氏“废弃遗命，紊乱家法，妄干政事”；^① 并说：“我没想到竟上了你这娘儿们的当。”^② 他的确是疏于防范，结果上了那拉氏的圈套。

十一月十一日（十月九日），那拉氏先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八大臣所拟的年号“祺祥”，以明年为“同治”元年。这段期间，她改组了军机处，并把一些亲信安插到政府的重要部门。为了酬谢这次改变的主要帮凶，她授任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实际成为这个中枢部门的主持者。曾与外国侵略者签订过《天津条约》的卖国贼桂良，经常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文祥，都被任命为军机大臣。通过一系列的任免措施，那拉氏在奕訢等人的支持下把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全部攫取到自己手里。

但是，那拉氏这时并没有急忙粉墨登场。因为她懂得自己干下的篡夺勾当既须取得舆论的公认，更要获得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这还需要时间。

十一月二日（九月三十日），原先留在北京的一些大臣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等在那拉氏回京召见之后，联合上了一道请皇太后听政的奏疏。奏疏就“赞襄”二字大作文章说：“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

①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第27页。

②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7页。

疑虑乎？”^①接着他们提出“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秉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②但是这种劝进，还不能使那拉氏感到完全满意。

同一天，胜保也上了一道劝进的奏疏。他写道：“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③疏中还举出“我文皇后（顺治帝之母——引者）当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④为那拉氏垂帘听政找到了本朝的先例。这道奏疏切合了那拉氏的心意，也博得了地主买办阶级大大小小人物的赞许。

舆论制造得差不多了，但还留下一个问题：奕訢让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遗诏早已颁布天下，事实俱在，如何抹掉呢？这只能由那拉氏亲自下手。她在十一月八日（十月六日）以载淳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公然说：“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⑤把奕訢遗诏否定得一千二净，真是弥天大谎。那拉氏在垂帘听政以后，本来还打算进一步销证灭迹，将那道遗诏销毁，但她毕竟作贼心虚，又无法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因之未敢下手。十二月二十日（十一月十九日）下诏说：“所有造作赞襄政务谕

①② 贾桢等：《政权操之自上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40卷，第2页。

③④ 胜保：《请亲理大政疏》，见《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40卷，第3页。

⑤ 《清穆宗实录》，第6卷，第15页。